

反抗、收编与互融 ——“异质性”空间与文化霸权及资本逻辑的辩证关系

肖炜静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福柯的“异托邦”、索亚的“第三空间”、列斐伏尔的“差异空间”等理论都显示出对“异质性”空间的重视。“异质性”空间具有开放性、边缘性、反抗性等特质, 由于被压制而更具革命潜能。但文化霸权与资本逻辑对“异质性”空间的收编和利用从来没有停止: 既压制差异, 又创造、利用差异; 既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同质化与无害化, 又通过商品化使其卷入全球资本发展中。“异质性”空间始终是一种理论探讨而非实践策略, 它与资本逻辑和文化霸权的关系由对抗、利用, 到彼此融合。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引入动态与辩证的视角, 并注意到“差异”的自我否定性以及空间固化的物质属性与理想空间不断变化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异质性空间; 第三空间; 异托邦; 分形空间; 资本逻辑; 文化霸权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3-0010-08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不满足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固化空间, 从不同角度对空间理论进行了探索。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以“情感性”为特征, 吸收了现象学的“主体—身体”理论, 如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栖居”,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等理论, 探究人与场所之间的感知、回忆、想象、认同、情结。代表人物有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挪威建筑学家舒尔茨等。第二条路径以“批判性”为特征, 主要思想资源是诸多具有“反叛性”与“怀疑性”特质的理论, 如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 主要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索亚等。在这些理论中, 空间是充满斗争、禁忌、反抗、幻想的多元性存在, 反映并重构着现实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three way dialectic)、“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s), 还是索亚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s), 都特别关注空间的“异质性”, 并传递出反抗现实的指向。然而, 资本逻辑和文化霸权却又时刻准备收编、利用这些“异质性”空间。讨论资本逻辑和文化霸权与这些“异质性”空间的辩证关系, 无疑更能从本质上探究这些“异质性”

空间的反抗潜能和固有局限, 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后大都市时代”地方商品化的问题^①。

一、“异质性”空间的崛起及诉求: 反抗文化霸权及资本逻辑

“异质性”空间在索亚、福柯、霍米巴巴对空间的阐释中都有体现, 只不过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霍米巴巴从翻译理论与后殖民角度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间隙空间”(interstitial space)、“居间空间”(in-between space)^[1], 福柯更看重空间内部结构体现出的权力与规训, 而索亚则既吸收前人的空间理论, 又具体探究洛杉矶、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后大都市时代”空间布局的新变化^[2]。将这些人的理论归结为对“异质性”空间的重视, 主要基于其鲜明的反叛性与指向性。“异质性”空间的第一个反叛对象是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分裂, 这同样也是当代空间理论的创新之处, 列斐伏尔和索亚在这方面都有深入的阐释。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从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维度来理解空间。首先是与直接的物质性相关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 空间既是生产活动的场所, 空间本身又不断进行自身再生产。其次是空间的表象

收稿日期: 2017-11-29; 修回日期: 2018-03-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17ZDA269)

作者简介: 肖炜静(1990—), 女, 福建漳州人,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理论, 联系邮箱: 544038299@qq.com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那是领导者、社会精英、建筑师们等构想的空间。在客观、中立、最优选的表象下充斥着权力操作与意识形态宣传。最后是再现性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 它既是前两者的结合, 包含了真实的物质性空间和想象性空间, 又反映出现世生存的真实体验, 而非服务于统治的抽象化真理^{[3](38-39)}。列斐伏尔用认知(the perceived space)、想象(the conceived space)和体验(the lived space)概括三者的特征, 力图克服形而上学的抽象空间、主体体验与规划的空间、地理建筑的物质性空间三者的对立。索亚则关注空间、历史与社会三者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第三空间”, “它发端于传统的物质和精神的二元空间, 但是也在范畴、实质和意义上超越了它们”^{[2](11)}。

“异质性”空间理论的第二个反叛对象是固定、单一、主流的文化霸权与资本逻辑。这种反抗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 从空间广度上看, “异质性”空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无限性。索亚将其与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联系起来, 那是包罗万象并拥有无限可能的场所^{[2](54)}。而福柯在讨论“异托邦”时, 虽然阐明了六个特点^[5], 但是并没有对其进行具体定义, 只是指明其“差异性”, 以至它可以拥有无限广度。正如阿兰·布洛萨所言: “异托邦的本义就是: 这个清单永远也不会完结。每个人都能在此状况下对之有所体会: 一旦开始被这个主题纠缠, 就会在阅读过程中、在旅行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异托邦经验。”^[4]这种无限性既指范围的广度, 也指现实状况的灵活性与复杂性。福柯将其定义为: “拥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 既将其隔离又使其得以进入。”^[5]也就是说, “异质性空间”既有“开放性”, 也有“排他性”。所谓的“排他性”, 即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进入, 它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禁忌。所谓的“开放性”, 就是在某个时刻, 我们当中的任何一员都有可能进入其中, 或者是自愿, 或者是被迫。比如说军营、疯人院、医院等, 当你被外界诊断为需要疗救的“非正常人”时, “异托邦”就向你敞开了大门。

其次, 从内部构成上看, “异质性”空间往往具有边缘性、多元性与混杂性。索亚在论述“第三空间”时, 特别关注那些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并被忽视与压制的空间与文化, 如萨义德所揭示的被“欧洲中心主义”构想出来的东方、由被异性恋规则所压迫的同性恋群体所构成的空间(如美国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 或是与繁华市中心截然不同的郊外的铁轨、旧房屋、老城区等。它们因为被压制而成为边缘, 又因为被忽视而

暂时规避了文化霸权的彻底侵袭。正因为文化来源并不同一, 所以“异质空间”才有霍米巴巴所称的“杂合”“居间”的状态, 如我们所熟悉的唐人街。当然, 这种异质性场所也不是绝对自由无碍的, 很多时候它同样会受到社会规则的管制, 甚至因为过分禁忌而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福柯据此又将“异质空间”分为两种, 一是为处理危机而产生的特殊性禁忌空间(the heterotopia of crisis), 如月经期的妇女、产妇所居之地, 她们是禁止被接近和观看的人群, 一是偏离正常社会系统的空间(the heterotopia of deviation), 如精神病所、监狱等场所^[5]。

最后, 从精神指向上看, “异质性”空间具有他者性、斗争性、反叛性。所谓的“他者”, 在后殖民主义、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中内涵有所不同, 但往往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 它与中心、主流相对, 各种属性与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文化或人群相异, 并且被理解为比中心低一级, 如西方中心主义对东方的想象。另一方面, “他者”化的场所既是被镇压之地, 也是反抗的中心, 由于霸权还未完全渗透该地, 因此便是多方势力汇聚、斗争的场所。也就是说, 与“异质性”“他者化”相伴随的就是反抗性与斗争性。这种斗争不是对现实的直接颠覆, 而是通过无法被当下规则系统所收编的“剩余物”来进行反抗。正如福柯的“异托邦”, 往往被放在与“乌托邦”(utopia)、“恶托邦”(anti-utopia、cacotopia、kakotopia)的相互参照中来理解。三者的内涵和外延具有诸多相关性, 但又有明显不同。“异托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差异性、他性, 以及由此而生的“反抗现状”的批判性, “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以及“恶托邦”的黑暗未来, 都跟现实具有差异性, 因而也都具有一定的批判功能。有所不同的是, “乌托邦”和“恶托邦”更多地是以一种“宏大叙事”的角度来构想某个或光明或黑暗的世界。它们所营造的另类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彻底颠覆, 内部具有完整的结构, 直接否定了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异托邦”则存在于现实之中, 并且选取了现实的缝隙, 通过小规模反抗来实现内部的爆破。

由于“异质性”的人群与场所是以“被排除”“被压迫”的方式被纳入现存系统之中, 因而也最具有革命性与反抗性。如果说启蒙以来对时间与历史的重视, 表现在将希望赋予不断进步的未来, 那么当下对于空间的探索, 则将这种反叛性赋予被压制和忽视的“异质性”空间。它们所要反抗的对象, 一个是文化霸权, 一个是资本逻辑。然而, 文化霸权与资本逻辑总是有强大的收编“异质性”因素的能力。

二、文化霸权及资本逻辑的空间策略：学理化与商品化

“异质性”空间，首先要面对的是文化霸权的侵袭和压制。“文化霸权”可以从两个含义上来理解，一是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支配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涵。它被臣服于统治阶级的人所接受和内化，并在无意识当中将其视为“常识”。据威廉斯的考察，如果跳出国家内部，霸权还被用来说明某些“超级大国”支配他国的手段，许多时候也被当成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替代词^{[6](144)}。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亚和霍米巴巴对“异质性”空间的论述往往会加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文化霸权”的第二个内涵可以从文化内部来看，即主流的、传统的、编入教科书、被学者们反复阐释、进入教育审核程序的官方文化脉络。它包括某些经典书目、代代相传的共识性阐释及成套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原本阐释“异质性”空间概念的“异托邦”也被用于阐释青年亚文化，因为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反抗^②。只不过，这种“异质性”文化非常容易被收编。赫伯伯格就指出了两种收编方式，一种是将亚文化的符号转化为大量生产的商品，一种是主流系统对其进行标签化和再定义^[7]。无疑，这两种收编方式就是将“异质性”因素纳入资本逻辑和文化霸权之中。

任何旨在反抗固化思想和现存规则的理论都会遇到文化霸权的收编问题。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态往往会用压制、放逐、忽视等手段对待异质性文化。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自我的绝对地位，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排斥异端”的行为向处于主流文化内部的人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就如同掌握暴力手段的司法系统通过对不法分子的惩治、隔离和处罚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同时，收编过程既可以凸显已有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又可以将异端文化具有的反抗性与危险性彻底清洗，将其无害地融入已有系统之中，变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这非常类似于文学中新生的作品被旧传统吸纳的过程。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一书中曾有过精彩的说明：“在新的作品到来之前，现有的体系无疑是完整的。但是当新的作品介入之后，体系如果还想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有所修改，尽管这种变化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之后，所有的作品与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和价值都会得到新的调整，这其实也意味着新作品和旧体系取得了一致。”^[8]也就是说，

一旦被吸纳到旧有系统中，既意味着“异质性”因素不再低下和边缘，被众人熟知，但同样意味着原本体现出来的革命性和新奇性已经消失殆尽。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异质性”空间所传达的边缘人群的诉求，既有可能被现存的规则系统无害化处理，也有可能被其真正吸收，使得现存系统和规则不断精进，更好地保障边缘人群的权力。

除了文化霸权之外，“异质性”空间还很容易被资本逻辑收编与利用。资本逻辑对空间的重视在自由竞争时期体现得并不明显，在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的时代，掌控“时间”对于资本效率的提高更为关键。农业社会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诞生时，时间才变得可物化和量化，并被精确掌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资本家既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又可以通过机器的更新，使得在同样的工作日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剩余劳动时间增多，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虽然空间在资本发展早期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但还是具有一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空间的集中规划，也就是将原本分散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厂房这个固定的空间中，可以节约成本并提高效率，与之相配套的是机器的大生产和个体工人的精细分工。第二个方面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虽然说资本家往往会标榜“节欲”的作用，认为其生产成本来自资本家个人的勤俭节约^{[9](682-691)}，然而，真正的原始积累，从来不是田园诗式的温情脉脉，而是充满暴力与杀戮，它往往发生在某些“外层空间”，如殖民地^{[9](820-823)}。对“非资本地区”的掠夺是资本扩张的重要一环。这在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资本主义的阶段尤其明显。

在帝国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对空间的规训和编码进一步凸显。资本的运动包括生产、流通与消费这几个阶段。消费过程是剩余价值能否实现的关键。在简单再生产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都被资本家消费掉。但是如果资本家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危机就很容易爆发。因为商品的价值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不变资本由资本家购买机器和原料组成，可变资本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并被工人消费掉，至于剩余价值，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被资本家自己消费掉，剩下的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如何找到额外的市场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卢森堡将非资本主义体系引入讨论范围，资本需要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空间充当原料的提供地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因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往往体

现在对非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权的争夺之上^[10]。卢森堡对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已经涉及资本对于非资本空间的收编和整合。通过整合和收编非资本空间，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爆发的时间。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进入“弹性积累”阶段表现得更加明显，哈维称之为“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所谓的“时间修复”有两个手段，第一个手段是投资“固定资本”，即铁路和各种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固定资本的价值是一点一点转移和回收的，周期长、规模大，既可以有效延缓实现剩余价值的压力，又能吸收大量的剩余资本以及劳动力。第二个手段是大力推广信用体系。投资者可以大范围吸收社会闲置资本，消费者提前消费也有利于剩余价值早日实现。所谓的“空间修复”，即充分利用交通的便利和货币、金融资本的机动性，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市场、劳动力以及最佳生产区位。只不过，固定资本难以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金的自由流动。同时，老旧的固定资本和以往投资的空间区位，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实现剩余价值之前就贬值。为了采用最新的技术和更最大限度地运用空间优势获取剩余价值，旧的机器和地区可能会被放弃，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11]。

文化霸权将“异质性”空间学理化与无害化，资本逻辑将各种空间商品化与数字化，其实不过是规训空间最基本的方式。事实上，二者对于“异质性”空间的收编和利用是无处不在的，最后甚至会使得原本互相反抗的事物达到彼此融合、难分难解的地步。

三、“异质性”空间与资本逻辑和文化霸权的互融：分形空间及多元化意识形态

卢森堡和哈维对资本空间的分析都透露了一个关键性的矛盾，即资本发展过程中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矛盾，或者是资本空间与非资本空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迫切需要全球性的“不平衡地理空间”，也就是通过“异质性”的非资本空间来扩大市场并寻找原料产地。另一方面，资本在利用这些非资本空间的同时，又不断地对其渗透与同化，并将其纳入资本发展的全球性空间之中。久而久之，资本所需要的“异质性”非资本空间将会越来越少，全球性的危机也就有可能爆发。虽然科技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便捷使得资本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生产地和消费市场，甚至促进某些边缘地区的现代化，但是造成的恶性结果也

不容忽视。最明显的是造成全球性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关系，这种不平等是全方位的，既涉及利益的分配，也包括自然资源的消耗、不同等级产业形态的差异等。从城市的角度来看，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会导致城市内部频繁的恶性改造和资源浪费，而原本的工业大城市也有可能因为区位优势丧失而日渐凋零，甚至成为“废城”。在空间更迭的内部其实也隐藏着时间的作用。资本流通的时间越少，商品越快销售完毕，那么剩余价值就越早实现，新一轮的投资也就越早开始。也正是因为交通和科技的迅速变革，部分地区的区位优势才会丧失。迅速更新换代的不仅仅是商品，还有生产技术、生产地点甚至资本家自身。因为他们不过是特定环节的承担者，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加速前进。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言：“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12](34-35)]虽然说“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必然伴随一种对旧有的秩序和生产力的解放与调动，但是这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和流动，而是符合资本逻辑的流动。德勒兹将其称之为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与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交织的过程^[13]。所谓解辖域化，即相对于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通过私有制、货币、商品等手段大大地促进了劳动力、土地、资本、欲望的流动。所谓再辖域化，就是资本社会绝对不允许被解放的各种因素妨碍剩余价值的生产，总是利用各种机制将它们重新纳入利润生产的轨道。对于“异质性”空间更是如此，资本可以允许“异质性”空间，但那始终是符合资本积累的空间，甚至“异质性”空间需要资本的注入才能继续存在和有序发展。以福柯的“异托邦”为例，由于福柯没有对其严格定义，使之既成为多元开放的概念，可以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被激活，又隐含该概念可能被滥用的弊端，甚至因为过度使用而失去原有的反抗性。最初多元性、开放性、反抗性、边缘性的空间系统，在现代消费社会之中，甚至多了罗兰·巴特意义上的神话学标签化与符号化的功能，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吸引游客的有效说辞。诸多场所既呈现异域风情，具有疗养休息的功能，同时又充满了高大上且小清新的文化因子。这种广告式的命名，在当代诸多无法归类的旅游文化、文艺范小资情调的推销当中最为明显^⑧。

正如第一部分所言，“异质性”空间的产生是与整个知识界对那些在资本系统中被忽略、被压迫的人的重视相伴随的。也就是说，被赋予革命希望的主体特

征从阶级过渡到种族和性别。即不单单只是寻找被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而是寻找被男性压迫的女性、被异性恋文化压迫的同性恋者、被白人压迫的黑人来担当反抗的主体等。也正是如此,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就吸取了诸多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理论。但是如今,对特定性别、种族、性向的“特殊关怀”已经演变为一种“政治正确”。不仅原有的批判性指向大为减弱,并且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纳入其中,成为自身合法性的标志。这些曾经被赋予反叛性的多元化与差异化的理论与角色,甚至已经变成一种娱乐话语和商业游戏,例如“各种同性CP”的炒作。由于文化霸权与资本逻辑双管齐下,“异质性”空间要保持那种理想状态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因为那原本就不过是理论性的阐述和话语上的革命。最重要的是,由于资本的灵活性、流动性与变革性,资本不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进行投资,如今还特别重视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微型化与区块化。通过数据的整合实现资源的调配与投资,将统治的触角伸到日常生活与主体感知中,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从具体的现实来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渐渐开始步入“后大都市”时代,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都呈现新的特征。对现实空间而言,原本集中的“福特式”城市,已经开始去中心化、碎片化和分形化,不再全部以中心城区为中心。一方面,不同空间之间相互隔离,办公、娱乐、住宿、旅游等场所呈块状分布。另一方面,区隔化的多元空间又凭借发达的交通和产业的分工相互结合。索亚将其称为“分形组织”(fractal city),“fractal”既有碎片之意,表示彼此分隔,又预示着功能相关性,具有拼合的可能^[14]。这种新型城市不仅缩小了大城市的规模,缓解了人口压力,而且对于保护生态、拉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也有关键作用。同样,对于网络空间而言,每一个人、节点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人人拥有自媒体,使用各种APP,在发表观点的同时又在网络上购物与娱乐。碎片式、原子式孤立的个体往往又与有序分块、数据递归相结合。大量碎片空间通过精密算法彼此连接起来,形成复杂的递归秩序和有意义的链接,有利于资本全景式地鸟瞰消费者和使用者的需求,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进行产品优化。对于使用者而言,一方面,网络空间大大扩宽了个人的信息来源,它将个人的娱乐、购物、游戏与在自媒体上发声连成一线,使其有可能通过数据关联而找到诸多相关的产品和同圈子的爱好者或者校友、朋友;另一方面,由于数据的巨大与庞杂,个人不过是数据库中的微不足道的存在,除了大V之外,普通人在自媒体上的发

声往往会被淹没在无尽的信息碎片之中^[15]。此时,即便“异质性”空间真的存在,它要么变成资本数据中的一员,要么没有任何影响力,只是个人的自娱自乐。

可以发现,无论是文化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异质性”空间与文化霸权和资本逻辑已经不是简单的压制与反抗的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所谓的反抗指向,变成一种单纯的话语构想。

四、文化理想空间的构造: 固化与变革的辩证

以上对于“异质性”空间的崛起以及它与文化霸权及资本逻辑的辩证关系的探究,是从一个较为宏观、跨学科的视野入手,涉及空间理论、文化理论、后现代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诸多内容。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主要是因为目前学界在论述“空间转向”的时候,由于学科和论题所限,往往就空间论空间。但事实上,资本逻辑与文化霸权对空间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异质性”空间作为空间反抗性的代表,更容易受到二者的制约,从它们之间由对抗到收编再到彼此融合的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福柯、索亚、霍米巴巴和列斐伏尔等人对于“异质性”空间的探讨,始终是一种理论构想,而非实践策略,这也使其只能在话语阐释层面上滑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现实基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维度在反抗资本逻辑与文化霸权方面无法发挥作用。事实上正好相反,从地缘政治学与历史现实上看,处于边缘性的空间从来都是最容易发生革命的场所。如第三世界对于第一世界的反抗,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更以其领导的“十月革命”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实现革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除此之外,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通过聚集被忽略、被压制,但同时又有巨大力量的“星星之火”,展开“燎原”之势。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地理因素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它并不局限于被压制的“异质性”空间,繁荣的商业区与衰败的贫民区并存的大城市作为工人阶级聚集之处,往往也是革命爆发的地点。同时,也可以是广阔的全球性空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了“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12](66)}。

第二,在探讨“异质性”空间时,不仅要联系文化霸权和资本逻辑的渗透与侵袭,而且要防止将两者

简单地理解为压制与对抗的二元关系，需要引入动态与辩证的视角。也就是说，文化霸权和资本逻辑往往会采取两种方法对待“异质性”空间。第一种方法是将那些具有反抗性的“差异”同质化与无害化。文化霸权往往对新生的“异质性”因素进行符合原系统的学理化阐释，将其并入原有的知识体系。而资本逻辑则是对各种“非资本空间”进行商品化，使其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第二种方法则是主动地生产差异、创造差异、利用差异。对于资本来说，主要表现为在弹性积累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福特式”城市的衰退、新型“分形”城市的崛起、通过大数据进行信息分块与整合等。对于文化霸权而言，多元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正确”的判断标准就是其创造差异、利用差异的典范。“异质性”空间的崛起及其与资本逻辑、文化霸权的对峙，进而被收编与利用，最后互相融合的过程，其实是后现代以来各种试图打破陈规、通过差异进行反抗的理论的共同困境。

第三，“异质性”空间的首要特点是差异性，但是“差异”本身又是一个自我否定性的命题。虽然“差异性”具有打破本质主义、整体论和决定论的指向，有利于提倡不满足于现状、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战斗精神。但“差异”的标准是在对比之中形成的，为了时刻保持“差异”，甚至需要不断地制造“差异”、生产“差异”。这种“自我否定性”的特质，在文学理论中的典型例子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巴赫金在论述俄国形式主义时，提到其“只破不立”的特色，认为那是“文学史中否定”的方法。首先是对日常语言的否定，其次是对上一代诗歌语言的否定。从整体上来说，似乎没有独特的、鲜明的诗学体系，只是一直提倡“自动化——变形”罢了^[16]。正是因为这种绝对的“否定”，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陌生化”总有一天会落到自己身上，即“陌生化”的理论也会过时，需要被再次“陌生化”。但也正是因为“陌生化”无明确的美学要求，它才可以被运用在不同的理论之中。如果被赋予单一的美学内涵，总有一天，它的批判性就会完全消失，成为一种彻底固化的美学形态。“异质性”空间的“差异性”特征也是如此，纯粹而无定义差异，既是其理论的生长点，也是其无法真正具有反抗力量的原因。

第四，“异质性”空间作为被赋予反抗力量的场所，还需要面对空间作为一种切实存在的物质属性所具有的“固化”特征与理想空间不断变更、反复调整、永不满足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空间与时间矛盾的一种转化形式。空间理论的勃兴其实就是对于长期以来占据

统治地位的线性时间与历史主义的反叛。正如威廉斯所言，历史主义不仅是对过去事实的客观记录，而且是“刻意地强调各种不同的历史状况及脉络情境；通过这些历史状况及脉络情境，所有的特殊时间必定可以得到解释”^{[6](147)}。也就是说，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反叛，更多的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变。因为时间的前后往往预示着因果性逻辑，而历史的发展则代表进化论传统。对线性时间的反叛由来已久，如柏格森的“时间绵延”与现象学的“晕圈”，都试图打破线性时间具有的“无数个过去变成瞬时的当下”的传统。对历史主义的反叛则可以通过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解构传统历史的客观与中立，突出历史书写的叙事策略与意识形态。第二条路径则是反对连续、进化的时间观和对伟大人物、重大事件的历史书写，关注碎片化、断裂性、偶然性、无序性、边缘化的历史与人物。如本雅明的“弥赛亚”时间以及福柯对不同时间段被压制的“疯狂史”的阐释。第三条反线性时间和历史进化的路径就是对空间的研究。正如福柯所言：“19世纪最令人迷恋的是历史，……但如今，我们处在同时性与并置性的时代，既远又近，既靠近又分散。我们已经不处在时间的绵长发展之中，而是处于点与点构成的网络联系之中。”^[5]福柯无疑指明了“空间”的几个关键性特点，如同时性与并置性，以及不同空间之间“点与点的网络联系”。然而，虽然说“空间转向”扭转了时间与历史的统治地位，但是“异质性”空间本身所强调的变革性与空间具有的固化物质属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哈维将之称为“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之间的矛盾：“任何过程乌托邦理想的纯度不可避免地被它的空间化方式所破坏。完全同样地，空间乌托邦的具体实现与被动员起来制造它们的时间过程相冲突，所以过程乌托邦理想与具体实现它所必须的空间框架和地区结构性是相互冲突的。”^{[17](173)}也就是说，相比“转瞬即逝”的时间，空间的内部构造较为固化，改动它需要耗费重大的人力与物力。加上我们对于理想空间的追寻始终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这无疑加剧了空间变革的实施难度与实践成本。正因为如此，哈维提倡一种“辩证乌托邦”与“时空乌托邦”^{[17](195)}，所谓的“辩证”与“时空”，其实是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方法论的强调。在学理层面上，应该在资本逻辑、社会生活、物质构造等多个角度探究空间格局，使得表面静置的空间更具丰富性。在实践层面上，在提出理想空间样态的同时，又根据切实的现实不断调整，使其处于变革之中。当然，如何将其落到实处，

需要在现实操作中不断摸索与探寻。

五、结语

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开启的“形而上学”空间被牛顿、莱布尼茨、康德等人继承和发展。这种空间模式探索有两个特点:一是将空间理解为物体所占据的处所和容器,空间是静态、绝对与固化的。二是将主体感知的空间与抽象的空间二元对立,并将后者认定为真理性存在。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几何学和数学的空间逐步从它们共有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解放出来,走向精细化和系统化。现象学空间理论则张扬科学化空间无法解释的主体感知。但无论是主体还是空间,都不是自在自为的,而是始终受到文化霸权和资本逻辑的影响。“异质性”空间的提出就在于它既克服了形而上学空间的主客对立,又试图抵抗文化霸权和资本逻辑的规训。

列斐伏尔将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空间看作是量化和均质的空间,也就是所有元素可以交换的商业化空间,它无法忍受任何抵抗和阻碍。而理想的社会主义空间则与之相反,它是一个差异的空间(a space of difference),“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汇合在一起消除所有的差异……而社会主义空间将是一个差异的空间(a space of difference)”^[18]。这种“异质性”空间,被诸多理论家赋予反抗性力量,但是同样面临被收编和利用的命运。正如哈维所言:“资本主义为了生存下去不断创造其自身的‘他者’。”^[19]“异质性”空间无疑就是“他者”中的一员,时刻面临文化霸权和资本逻辑的清洗、收编、利用与融合。但不可否认的是,“异质性”确实可以在话语层面充当一种扰乱现实的力量。它提醒我们,在这个同质化的商品世界之外,还可能存在着另一种形态的现实,它因处于边缘地位而被忽视,但更因差异性而具备革命潜能。

注释:

- ① “后大都市”是索亚对当今城市新形态的概括。“地方”(place)是人文地理学及空间理论的关键概念,往往是指某种具有特定地域特色和文化情感的场所。对“地方”概念的梳理可参考陈浩然:《西方文论关键词:地方》,《外国文学》,2017年第5期。关于地方个性消解与商品化的问题,可参考胡大平:《地点的褪色:空间的商品化生产及其文化后果》,《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 ② “它对‘主流逻辑’的毁坏、表征、抗议、颠倒,全部来自它的异质性——不知道、不关心、不care,自己和自己玩。中国的网络文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异托邦。”(邵燕君:《从乌托邦

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 ③ “异托邦”原文为 *hétérotopias*, 也被翻译为“异形地质学”“他性空间”,它最初是医学专业术语,指的是医疗技术中的“异位移植”。福柯在其《他性空间:异托邦》(Of Other Spaces: heterotopias)中将其概括为六个特点。第一,任何文化中都存在“异托邦”,它不像乌托邦那样只是虚构出来的美好理想,而是现实中切实存在的场所。第二,“异托邦”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时代发挥的作用迥然有别。第三,“异托邦”往往将几个原本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相互并置。第四,部分“异托邦”发挥功能时需要借助时间。比如说市集、度假村、各种节日等,在短暂的几天中,人们可以拥有与平常的日子里不同的生活,这有点类似于巴赫金所强调的“狂欢节”。第五,“异托邦”具有“排他性”和“开放性”。第六,和乌托邦一样,“异托邦”同样具有理想性,但那属于对现实空间的理想规划,而非纯粹的幻想空间,福柯所举的例子是殖民地,因为那是开拓者新近规划的领地,一切都事先计划而成,并且井井有条——这是指建筑学意义上的理想,而非指完美的社会秩序。福柯并没有对“异托邦”做出精准定义,所举的例子更是多种多样。因此,该概念经常被用在广告营销与“小资情调”之中,失去了任何“反抗性”意味,如朱艳蕾:《文艺范异托邦与无衣可穿》,《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8期。冯博一:《乌托邦,而且异托邦——关于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世界美术》,2016年第2期。关于福柯“异托邦”概念的具体阐释及其在中国的流变问题,可参考拙文肖炜静:《福柯“异托邦”在汉语世界的语义分叉、创生驱力及理论反思》,《华文文学》,2017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3, 216.
- [2] EDWARD W. SOJA.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 Inc, 1996.
- [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 [4] 阿兰·布洛萨. 福柯的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J]. 汤明洁, 译.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5): 155-162.
- [5]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heterotopias[J]. Architecture/Movement/Continuité, 1984(10): 46-49.
- [6]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7] 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9: 94.
- [8] ELIOT T S.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1: 44-45.
- [9]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0] 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M]. 彭尘舜, 吴纪, 译. 北京: 生活·读

-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257-376.
- [11] 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M]. 张寅,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311-379.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GILLES DELEUZE, FELIX GUATTARI. Anti-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240-261.
- [14] 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0: 264-297.
- [15] 高小康. 从微时代到 APP: 后一后现代美学的互空间性[J]. 文艺研究, 2016(2): 5-12.
- [16]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二卷[M]. 李辉凡, 张捷,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89-192.
- [17]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M]. 胡大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8] CF. 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192.
- [19]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 沈晓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22.

Resistance, incorpor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dialectics between “heterogeneous” space and cultural hegemony and capital logic

XIAO Weij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Foucault’s “heterotopia”, Sawyer’s “the third space”, Lefebvre’s “difference space” all show special attention to heterogeneous spac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borderline, resistance and so on. It also has the potential of revolution because of its being suppressed. But cultural hegemony and capital logic always incorporate and integrate with heterogeneous space by both suppressing differences and creating or taking advantage of differences, by both homogenizing heterogeneous factors in ideology and involving it into global capital development through commercialization. However, heterogeneous space has always been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rather than practical strateg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pital logic and cultural hegemony has gone from confrontation, utilization, to integration.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needs to introduce the dynamic and dialectic perspective, and to notice self-denial of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material property of cured space and the ever-changing property of ideal space.

Key words: heterogeneous space; third space; heterotopias; fractal space; capital logic; cultural hegemony

[编辑: 胡兴华]